

当代西方哲学导论

爱智文丛

Notes of Western
Contemporary Philosophy

张祥龙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爱智文丛

当代西方哲学笔记

张祥龙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当代西方哲学笔记/张祥龙著.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1

(博雅爱智文丛)

ISBN 7-301-08421-8

I. ①当… II. 张… III. 哲学-西方国家-现代 IV. B5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130284 号

书 名: 当代西方哲学笔记

著作责任者: 张祥龙 著

责任编辑: 王立刚 徐 辉

标准书号: ISBN 7-301-08421-8/B·0298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北京大学校内 100871

网 址: <http://cbs.pku.edu.cn> 电子信箱: zpup@pup.pku.edu.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2022

排 版 者: 北京军峰公司

印 刷 者: 三河新世纪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650mm×980mm 16 开本 14.125 印张 235 千字

2005 年 1 月第 1 版 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7.00 元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

自
然
界
的
理
性



作者简介

张祥龙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研究领域为西方哲学，现象学专家，在中国和西方哲学的比较研究方面多有创获，代表作《孔夫子与现象学》、《海德格尔思想与中国天道》等。

内容简介

彰显理性的哲学写作一定是线性的吗？作者在此处展现了一种另类的哲学写作，一种作者同自己文本之间的对话。或许所谓字里行间正是意义蓬勃生发的所在，因为思想的每一时刻都处在一个放射状的树冠顶点，莫非这就是最原初的理性。在此，作者正是要努力恢复理性的这一原生质态。



《庄子哲学》 王博

《十九世纪德国非主流哲学》 靳希平 吴增定

《当代西方哲学笔记》 张祥龙

《西方哲学笔记》 张祥龙

《完美的自然》 彭锋

责任编辑 / 王立刚 徐 辉

装帧设计 / 奇文云海

目 录

第一章 引言	
——当代西方哲学的特点	(1)
第二章 实证主义	(12)
第三章 意愿主义(一)	
——叔本华	(24)
第四章 意愿主义(二)	
——尼采	(47)
第五章 实用主义	(73)
第六章 分析哲学(一)	(117)
第七章 分析哲学(二)	(159)
第八章 现象学	(185)
第九章 当代科学哲学的线索	(215)

»

第一章 引言

——当代西方哲学的特点

第一节 特点

现代或当代西方哲学的特点何在?它与传统的西方哲学的区别何在?国内讲这方面的书和文章往往以“科学主义或实证主义思潮”与“人本主义或非理性主义思潮”的区分来间接回答,这种观点未得要领。西方哲学从起源时起就尊崇“科学”(亚里士多德),尤其是演绎科学。当然,做这种区分者强调科学主义思潮注重的是实证自然科学^[1]、反形而上学,哲学不应超出经验事实。说到人本主义,就强调这一派认为哲学不能离开对人的关心,与传统哲学的区别在于它的非理性主义,因为它“转向了对人的独特个性、生命、本能的强调”,而不再是对人类共同本性及普遍的自由、平等、博爱的颂扬。^[2]

这种刻划的缺点在于:第一,未能指出“现代西方哲学»学”的共同特色。(即使其特色恰在于“多元”、“无共同性”,也应指出)

第二,分类不合适。从以下讨论可见,这两个思潮有许多相交之处,比如实用主义、结构主义、日常语言学派绝不只是科学主义,更不是实证主义。^[3]与所说的“人本主义、‘非’理性主义思潮”的距离不比与前一思潮远。而

此书名称为《当代西方哲学》,而不像一般的同类书,叫《现代西方哲学》,是因为“现代”(modern)与“近代”在英文里是同一个词,而近代西方哲学则意味着从笛卡儿到黑格尔,还属于这里讲的“传统西方哲学”的范围。“当代的”用英文表达是“contemporary”,意味着哲学上的后黑格尔时代,一直到现在。但是,为了与其他人的用法相互沟通,下面也用“现代西方哲学”的表达方式,其含义等于这里讲的“当代西方哲学”。

该书由讲义而来,在课上和整理时,常有即兴之思,便放在括号里。希望读者可以原谅或习惯这种“横插一笔”的风格。

“理性” (rationality) 这个词可作狭义和广义两种理解。其狭义指“与感性相对的认识能力”，判断、推理；其广义是指“合适地运用人的心智”，或“能意识到自己行为的理由与后果，而加以调控”。我是在广义上使用这个词，因为这样才能比较准确地说明我们面对的哲学形势。不少人在狭义上使用这个词，却在广义估量它的后果。比如，当他们说一个哲学家或其学说“反理性”时，是在狭义上用的〔其义不过是说这个学说反对割裂理性与感性〕，但往往隐含着这样的贬义：这个哲学家只知表达他的主观感受和情绪，而不给出严肃的理由和论述，所以

且，更重要的是，整个现代西方哲学的主流（除了一些“孑遗物种”，比如新托马斯主义）有着一种独特的风格，与传统西方哲学差异很大。它的吸引人之处和令熟悉传统西方哲学家困惑之处，正在于此。

第三，强调“科学主义”的观点未看到“实证自然科学”远不能尽现自然科学的特点。比如自然科学与演绎科学的内在联系，这在20世纪的自然科学（相对论、量子力学）中及20世纪的科学哲学甚至是分析哲学的发展中表现得越来越明显。“科学”的概念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科学主义思潮”的说法基本上未反省这些新动态。

第四，“人本主义”就是改成了“个人人本主义”也不成立，笛卡尔、康德、休谟心目中的“人”都是“个人”，而后期海德格尔、伽达默尔的解释学、后期维特根斯坦、杜威的政治哲学等都不是个人人本主义。讲“个性、生命、本能”倒确实沾边儿，但一来局限性很大，未列举出足够多的特性（比如对胡塞尔和海德格尔就不适用），二来缺少方法上的含义，“反理性主义”则对大多数不适用。

总之，科学与人本、理性与反理性这些范畴基本上属于传统西方哲学的时代，用来刻划现代西方哲学过于陈旧而不合适。

在我看来，现代西方哲学或思潮的最大特点和大趋＜＜向在于对于一个惟一的 现象世界的可能性或可直接理解性的关注。这当然是对传统形而上学（唯理论的存在论和宇宙论）的反叛，但也并不就是传统的经验主义，尽管有些人，比如逻辑经验主义者一开始误认为某种新形式的经验主义；因为这“现象”不是与“本质”（本体、实体）相对而言的被动的、分立的、片面的现象，而是构成了一个“世界”（Welt, World），是一个“惟一的”，即能够产生和维持认知意义、人生意义的自足世界。这不完全等于相对主义、现象主义意义上的“反本质主义”，（“本质主义”——

认为现象之后有不变的本质，从存在论和认识论上讲，“本质[理念化的存在]”先于现象的“存在”；哲学和科学的任务在于去把握本质。)因为不少现代哲学否认的不只是本质，而是现象与本质的逻辑区分。

这种对于一个惟一现象世界的可能性的关注，体现在追寻那最活跃、也最本源的“直接可理解(或可操作)状态”，它与人参与的“游戏”或构造方式内在相关，不再完全信任任何依据某些概念原则和规则推衍出的东西。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也是出于无奈，因任何依据某些可表达的现成观念前提的推衍，都由于科学、数学、逻辑、技术的进步而变成了“科学”(心理学、物理学、生物学……)、“知识”，而非哲学或纯思想——那永远处于边界上的窥测、“虚”构和提示。(所以哲学总是在“潮汐”或“消息”中被感受到的)哲学根本不能靠划出一片特定“领域”(对象域)来成为“严格科学”，作为纯领会的哲学无领域可言，只有构成或(游戏)状态的方式可言。

如果与传统形上学相比，这种特性恐怕更易了解。

传统哲学家认定哲学是一门关于终极原因和原理的知识⁽⁴⁾，而且相信它寻求的是具有确定性的、关于现象背后的不变本质、理式或实体(存在之所以存在)的知识，因而被视为一种最高的科学。这一哲学观直到胡塞尔还被奉为主臬，因此，这种终极思维⁽⁵⁾中的游戏性不被辨认和强调，这样也就不关注终极领会的“境域”或语境，更谈不上关注这游戏语境的“边缘”或体验中的终极。

其实，数学和近代物理学的“明确性”要求不只是追求、甚或主要不是去追求抽象的“不变”，数学其实不能完全还原为逻辑；而是求更多样的“转化”、“双关”的可能性，也就是“可游戏性”，比如阿拉伯数学中的“10”，就与“1”、“0”、“11、12、……1n”、“ $x+y=10$ ”……相关，比文字表达有了更多维的相关和映射的可能，以造成更多样有

从哲学上讲是没有什么份量的。就是在这个意义上，1949年到70年代末的中国的著述中，将几乎所有当代欧陆哲学家都说成是“反理性的”。就是现在，也时常见到一些持概念理性观或实证科学理性观的人用这个词来责备不符合其思想框架的哲学学说，比如柏格森的、海德格尔的、萨特的等等。

因此，我主张在使用“反理性的”这类词时，要加上限定词，比如“反概念理性的”、“反观念化理性的”、“反实证科学理性的”，等等。如果确实是要说这个哲学家是在不合适地运用人的心智，那就说他是“反广义理性的”。

康德思想的妙处就是总有断崖和间隙，绝不让人一览无余。

我将 Schema 译作“图几”，取《易经·系辞》中“几微”之意。

趣的“际遇”或新关联。

康德是个介于旧的和新的、传统的和现代的西方哲学之间的人物。他的批判哲学预示了黑格尔之后的哲学发展的一些重要特点，但又未脱尽传统哲学的框架和气息。在前一个意义上，他是个超时代的思想者，超出了他之后的德国唯心论（费希特、谢林、黑格尔），当然也超出了他之前的经验论和唯理论，所以新康德主义能在现代西方哲学中占一席之地。

康德比较鲜明地体现出“对一个惟一的（可直接理解的）现象世界的可能性的关注”的当代特点，尽管是以他的还有旧套子的方式（主体与物自体的二元模式、亚里士多德的逻辑、欧几里德几何学、牛顿力学）。他论证道：人的全部知识能力，包括数学的和自然科学的，所能达到的只是现象界，而不是物自身。而且，这现象界的内容结构并不像传统的唯理论和经验论所公认的那样只与感官知觉有关，而必亦涉及知性和统觉，因而本身就包含主客两边或两种特性，居于纯主体（主观任意性）与纯客体（与人无关的物质对象）之间，有自身的条理、范畴和直观形式。他追究了概念与直观的结合可能（此为最关键处），提出了“先验的想象力”→“纯象”（时间图几）。哲学所做的不是去获得这种现象知识，而是探求其可能的条件。而且，人虽不能以知识方式（将其当作对象）认识物自身，却可以通过非认知的方式——道德的、艺术体验的——与之有某种关联。这其实也是我们所讲的“直接可领会的现象界”（除了可直接领会，比如“信则灵”、“感受到美”之外，什么也没有）的相关表现。他严厉批评传统形而上学，其实是一切实质化概念哲学的基本方法，预示了未来西方哲学发展的方向。而且，他还痛切意识到数学对哲学的重大影响，尤其是两者的重大不同。哲学无法模仿数学方法的原因是：“哲学的知识乃由理性自概念所得之知识；

数学的知识乃由理性自构成概念所得之知识。所谓构成概念,乃指先天的展示‘与概念相应的直观’而言。故构成一概念,吾人需要‘非经验的直观’。”^[6]

>> 然而,康德还有不少受制于传统学术和哲学之处。比如:那使得现象可能的直观形式和概念范畴被认为是“先天的”(a priori),而不由经验本身构成。它们最终出自立体的“我”或“统觉”。因此,表现这现象界的知识被认为先天地要服从和惟一地表现这直观形式和范畴,而这就被康德认作为欧几里德几何学(表现空间的直观纯形式)、牛顿力学(因果律)及亚里士多德的判断逻辑,而后来的学术发展推翻了它们的先天性或惟一性。非欧几何、相对论、量子论和数理逻辑的出现极大地深化了、转化了人们对这个现象世界本身的构成性(“先验的想象力”)的认识,也成为逻辑实证主义者攻击康德的有力武器。然而,康德的伟大之一正在于他在20世纪还能让人条分缕析地挑出错来,而他思想的活力和卓见之处又超出了这些实证主义者。逻辑实证主义的迅速衰败和后来分析哲学的进程(后期维特根斯坦、蒯因等)表明了这一点。

正是由于对于现象世界的惟一性(自身的丰富性和结构性)和直接可理解性的越来越深入的了解,哲学家、思想家们逐渐放弃了各种形式的还原论(实在论、观念论……),而是就现象本身来追究其可领会的方式和条件。于是,真理变得“境域化”或“地方化”了(这在下节看得更清楚:总可有反例,但这新发现也不可线性地普遍化),现代西方哲学的主张越来越显得“破碎”、“有意避免总体化、主题化”,而是通过“构境本身”(语境、意境)的形式或方式来寻求理解。这就如(后)现代派的绘画、雕塑、建筑、经济、金融、国际关系、流行歌曲……一样。整个人类生存变得更富于语境、时境本身的引发力和不可测性,但又不是没有这境域本身的样式、道理。1989年的东欧和苏联

正因为如此,当代西方哲学才与传统西方哲学有了重大不同。不过,康德在传统西方哲学家中确实是相当特异的,有不少超时代的前见。

当代人及未来人们的机会与危险。

此断言过重，唯意愿主义起码隐含着哲学方法上的重大革新。

罗素哲学中亦有传统哲学的一面，像他的“逻辑原子论”，就很有还原主义的倾向。但他主张“关系是真实的”，却是当代西方哲学的特点。

的剧变超出了以前政治家、历史家们的想象力，而满身都是丑闻的克林顿居然臭遍天下而不倒，反倒在民意测试中自得其乐，也反映出当代人的某种生存方式和思想方式。现在似乎是不带些破碎之声、粗俗之缘、投机之瘾者就无现实的召唤力可言了。我在这里将要涉及的各种“主义”或流派，就都以各自的不同方式或残缺、或较鲜明地体现出现代西方哲学的特点和风格。

第二节 方 法

如果没有方法上的突破，尤其是科学方法上的突破，在西方思想界顶多只会有对传统形而上学的不满，不会形成浩荡的潮流。这样，（在演绎和实证科学的方法大突破之前出现的）孔德的实证主义、叔本华和尼采的生命哲学（唯意愿主义）等就都还缺少正面方法上的重大革新，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新意向的表达，而且往往是不恰当的、“过头”的表达，比如实证主义的还原论和唯意愿主义的（被人指责的）“反理性主义”面貌。而到了罗素逻辑实证主义和现象学，就有了更鲜明的当代方法的色彩，原因就是非欧几何、数理逻辑（特别是哥德尔的不完全性定理和塔斯基语义学）、相对论和量子论、格式塔、意识流、弗洛伊德心理学等新思路的出现在敏感的知识分子（首先是哲学家）中造成了极深刻的思想震荡和对创新的追求。

这些新突破在哲学中起作用的方式是：

一、对理念上的、概念上的惟一终极实在的否定。

传统的牛顿力学、欧氏几何，都在鼓励这样一种看法，就是一定有一个惟一实在的物质世界，客观的、不受人类活动（运动状态）影响的绝对时间和空间，以及一种

由直观所发现的自明的几何学公理(人与“绝对空间”的交接点)。然而相对论表明,如果对“同时性”的意义作深入追究,即在大尺度中或距离太大而使光的传导所费时间成为不可忽略的因素时,则可知从“逻辑上”或“原则上”,就没有理想的(由上帝确定的,或由一个“客观时间”决定的)“同时”。有的只是与具体的测量方式、测量者与

>> 被测量者之间的空间关系和排序关系相关的“同时”(“相对”而言的)。此外,没有必要设定有一种“以太”,来充作宇宙的基底和传导介质,并作为任何运动的绝对参照系。更干净简易的方法是认为:电磁波(光)的运动本身并不参照这样一个“以太”背景,也不会被光源的运动加速或减速:“光速不变”,这样算起来和看待这个宇宙反而更真切清晰。

量子力学则表明,将“物质”追究到基本“粒子”状态,则会出现“原子论”者想象不到的图象:波粒二象性,并不存在“哪个更真实”的答案,一切要以人的观察方式来决定。而“测不准原理”更清楚地表明,客观的物质存在与人的观察作为之间不可避免地相互融合,而且“概率”或“统计”必会渗入这种有干涉的观察之中。

非欧几何的发现,尤其是它后来在相对论中的应用使人明白,并没有惟一真实的空间描述系统。“过直线外一点只能作一条平行线”只是一种特例。并没有建立在直观内容(对象)之上的绝对自明,有的只是公理化系统的不矛盾关系(相容性)和结构原则。非欧几何与欧氏几何很不同,但它的真理性可以建立在欧氏几何之上,即如果

>> 欧氏几何成立,它也成立。这给人们以极大的新刺激,原来真理不在于与直观对象的符合,而在于系统内的一致性和系统际之间的相容性,也就是“纯形式的关系”。(这“纯形式”其实也有“说”的可能,见下)

于是,性急的、少“道”性的人们以直线方式来延伸这

这似乎在鼓励实证主义,其实它和量子力学所隐含的东西(比如“关系决定一切”)超出了实证主义的哲学前提。

西方哲学的产生与发展与数学有着深刻联系。数学思想方法的重大变化往往会引起哲学中的地震与火山喷发。

希尔伯特方案透露出西方学术思想乃至整个文化的一个重要倾向,即对于形式推演的痴迷和对于包含不确定性和含糊性的“意义”的疑惧。

种新思路的含义,认定数学的真理性可以还原为逻辑关系(重言式),或纯形式的语法关系,完全无意义可言。认为抛弃了直观意义就等于抛弃了任何“意义”、“语意”,再不与这些含混的、似乎总涉及某类对象的概念打交道。于是,就有了希尔伯特方案,即要将数学公理系统的相对相容性(一致性)的证明(比如证明非欧几何相对于欧氏几何、欧氏几何相对于实数论、实数论相对于自然数论的相容性)变为绝对或直接相容性的证明。因而证明论中数学或逻辑公理系统的基本“概念”不能再利用任何还需要解释的推演工具,而只能是无意义或无概念内涵可言的符号,公理是这些符号的机械组合,无所谓真假,数字相容性的证明变为不需要内容的纯形式符号的推导,可以按一个机械的模式在有穷步骤内进行和完成。这相合于前语意学的逻辑实证论者们(石里克、卡尔纳普早期、洪谦等)的主张:数学是纯分析的、重言式的、无任何意义的,也就是不会对人们对经验世界的认识有任何影响,数学命题不是“先天综合命题(康德)”。按照这个思路,逻辑实证主义者相信由逻辑的数学和普遍概念组织起来的理论命题本身是无意义可言的,其意义都来自可能的经验实证语句(记录句)和实证活动。“月亮背后有个大城堡”与“存在是一”的区别)这样,认识和科学的实在性就被惟一地归约为科学实证活动和它们产生的原子语句。这种还原论离常识实在论只有一步之遥了。爱因斯坦、海森堡、罗巴切夫斯基的那些激动人心的伟大发现被“归约”成了这么一种呆板乏味的实证与常识实在!但的确是不对的。

哥德尔的工作表明,一个数学的或推演的表达系统,只要丰富到了“初等数论”(即自然数系统)的程度,就不可能不具有本身所构成的“意义”,即总不能对本系统的整体性质(比如一致性)做出完全的形式化(语法)断定,不然它就是不一致的。也就是说,这个系统一定带有自己

的说话能力和“偏见”，因而是“不完全”的。他利用自己创造的配数法，就能在初等数论的形式系统 P 中自行地构造出一个自指的命题 A，用普通语言表示就是：

A：A 在 P 中不可证。

它和它的否定在 P 中都不可证，不然就成了悖论，从而使 P 不一致。但正因为如此，它是真的，它“所说的正是其肯定，不是其否定”（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中的“真理定义”）。而且，这个命题的可证性与初等数论的一
➤ 致性证明是联在一起的，因此，初等数论不可能从形式上“证明”自身的一致性。

它的含义是：分析命题决不只是重言式或句法命题，整个较丰富的演绎系统也必有所“说”，它所说的可以不涉及经验的直观对象，但必涉及这系统本身构成的“事态”或“语境”。命题 A 说出了某种事态，不是重言式，但它所说的正是自身的特性，即不可被完全句法形式化（无意义化）。而这个“说出”本身就确保了它的不可反驳性或真理性。其后或几乎同时，有塔斯基对于“真”的语义学定义，后被戴维森运用。这些新成就使得维也纳学派被迫做出实质性让步，承认理论命题不可还原为观察命题，而只有某种相关性。此牌一倒，多米诺效应便冲破了“经验论的两个教条”。

由此“逻辑”和“数学”上的重大突破，使得“表达系统本身所构成的意义（或“理论”）负荷”的问题突现，现象本身的可领会性越来越受到关注，而一个“统一所有科学”的还原方案，不管它是物理意义的、形式主义的还是形而
➤ 上学的，就都是落伍的思想了。“反惟一实在观与真理观”的深刻性和彻底性远远超出了实证主义者们的视野。

二、“语言的转向（转向语言）”：对于表达式系统本身的构成含义（“整体性”“转换性”）的关注。

非欧几何认为既然可以有不同的但各自有效的表达

以其人（希尔伯特）之道，还制其人之说。

对于这种反形而上学、反惟一真实观的倾向，可以用“黄巢反诗”的方式戏称为：

实体已死，境思当立；

岁在玄冥（时机），天下（社团化国家）大吉。

这一点为后期分析哲学、实用主义和欧陆哲学中的现象学所共尊。

学习当代西方哲学的最大益处可能就是从一种深层次的西方学术教条（比如传统的实在观、真理观、科学观、人性观……）中解脱出来，从而能以一种比较健全的眼光来看待自己的文化与知识遗产。

系统，那么“真理”就绝不只限于与某种对象（经验的或理念的）的相符合，而必与系统的构成方式有关。

传统的亚里士多德逻辑不成“系统”，只是一些对现成内容的形式的提炼，没有自己内部的推演结构，但数理逻辑却有了自己的“演算”结构，靠近了数学，成为一种人工的“语言”。（莱布尼兹当年的“普遍语言”的构想）

这就是所谓现代西哲中“语言的转向”或“转向语言”的方法来源之一。语言不再只被看作传输既定观念的符号串，而是一个有自己的结构生命、思想生命和表达生命的“生活形式”、“生活世界”。

三、结构多样性（质的多元性）：奇变永远可能是必要的。

非欧几何、相对论、量子论——仍是科学、更是科学，但却那么“怪诞”（违反理论常识）。可见“科学”、“思想”中有极大的未开发空间和自由创造的余地。（霍金说，一切基本原理和基础理论已有了。上个世纪末，迈克尔逊持类似意见）

新方法的影响途径是曲折的，充满了偏见干扰的，主要是实证的、形式的（语法的）、“科学的”偏见，因而看不到这些新思路中真正革命性的东西（现象本身的构造论——结构论）。这些思路同时包含一种对于西方学术中心论的冲击和否定。这种中心论总想以某种方式把持住一种独特的、普遍适用的规则或标志，来表明西方哲学、科学甚至整个文化在绝对的进化意义上是先进的，注定了要来领导全世界人的思维和行为。这一倾向直到今天，仍在中文学术界颇有影响。除了其他原因之外，从学术上或智力上讲的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领会不到或不能充分领会这些新思路的真切的方法含义，总在最初的激动之后又将它们含糊回“西方概念哲学的传统”之中去了。在这些半吊子解释中，海德格尔、维特根斯坦、舍勒、库恩等要

不就是传统哲学的顺沿,要不就是不值严肃看待的“反理性主义”。看不到他们的主张与最严格的科学方法突破的内在呼应。

注 释

- [1] 刘放桐等编著:《现代西方哲学》,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二版,6—7页。
- [2] 同上书,6页。
- [3] 同上书,17页
- [4] 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981b32—982a1。
- [5] 亚里士多德本人已经使用“终极”,《形而上学》982b5—11。
- [6] 康德:《纯粹理性批判》,蓝公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498页。